

对用统一标准划分方言的反思

——以“浊音标准”为切入点

麦 耘

提要 本文认为划分汉语方言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并以一向被视为划分汉语方言最有效的标准——古全浊声母今读类型为例加以说明。由于各方言在历史上的分化节点在年代上和创新内容上都各不相同,故现代方言的划分条件也应各不相同,才能正确反映方言分化的历史真实。任何一个或一组统一的标准都不足以在一个层级上划分所有汉语方言。本文暂拟一个汉语方言分化示意图,以期说明方言分化条件的复杂性。

关键词 方言划分标准 古全浊声母今读 分化节点 历史真实

1. 从平话说起

1.1 学界习惯于为汉语方言寻找统一的划分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全浊音的今读类型。

前贤们很早就注意到,古全浊声母在汉语现代各方言音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读音类型可以作为区分方言的一项重要特征,如赵元任(1928/2011)。丁邦新(1982)比较完整地提出划分汉语七大方言的6项条件,其中“古全浊塞音声母的演变”^①排在最重要的第一项。

广西的平话是个很典型的例子。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广西汉语方言图列有平话,分为桂南和桂北两片,并说明“南北两片差别很大。两片的共同特点是古全浊音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不送气,与粤语勾漏片相同。”(中澳合编,1987:B14)。^②

李连进(2000)主张平话自为一个大方言区,并把勾漏片从粤语划过来,其区别于粤语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古全浊声母塞音今读清不送气。李小凡(2012)进一步提出:只需用古全浊塞音今读这一条标准,即可确定平话的身份,其他方面即使差别很大,都不重要。

也有一些学者对以古全浊塞音今读作为划分平话的依据提出质疑,如丁邦新(1996)、韦树关(1999)、覃远雄(2000)、麦耘(2010)、侯兴泉(2016a)等。

1.2 笔者认为,韵母系统的特点更能反映方言的亲疏关系,至少在平话和粤语是如此。

桂南、桂北平话韵母上差别很大。桂南平话内部差异很小,韵母系统与中古汉语的格局对应整齐,三鼻尾三塞尾齐全,韵腹对应古韵摄也很少出格。这也是粤语的特点。反观桂北各地的韵母系统,多与桂南平话和粤语差得很远,跟古音对应相当凌乱,各地之间的对应每每也难言规律,无论用方言分化或方言影响来解释都很困难。如果用一条河流的各个水段来形容桂南平话各点,那么桂北就是一片沼泽,几乎在每一点上所取的水样都是不同的。^③

① “塞音”包括爆发音和塞擦音(与国内通行的、仅指爆发音的用法有异)。下同。

② 2012年《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B1-22作出改变,把平话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放在一起,分为桂南、桂北、湘南、粤北四片,指出桂南片古全浊塞音全读不送气的特点,而对其余三片则合起来讨论其在古全浊音今读方面的多样性(覃远雄,2007/2012)。

③ 南北平话及其与粤方言比较的材料和论述很多,本文不烦一一细论。

要说桂南平话跟勾漏片属同一类方言 绝对没问题; 桂南平话-勾漏片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大方言区独立于粤语之外, 也可以讨论。但是, 要是只根据古全浊今塞音不送气这一条就把桂北的很多点也划入这个“平话”方言里, 而且是仅凭这一条为平话与粤语划界, 实难信人。

1.3 李小凡(2012) 认为, 历史上在两广西部本来存在一个内部一致的平话方言, 后来外方言入侵桂北, 使本地的方言特征变得模糊不清。“考虑到土话和桂北平话大都仍具备中古全浊声母清化为不送气音的特征, 虽因方言入侵而呈不连续分布, 浊音特征也有不同程度的磨损, 目前仍可以视为同一类方言”, 即平话。就是说, 它们的“浊音特征”即古全浊音今读的类型相同是原本的, 一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 而其他方面变得面目全非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不过笔者觉得, 如果把对方言保存古全浊音读音类型顽强性的信心降低一些, 那么相反的假设应该更为可信, 即历史上不同的外地方言进入桂北, 在古全浊音读法这一点上被本地方言所同化, 而大部分音韵特征则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化, 遂造成今天桂北各地平话的巨大差异。

笔者以为, 若要分立“平话”方言, 古全浊声母今塞音读清不送气是个重要标准, 但还需有其他方面, 譬如韵母方面的标准。如果桂北某个方言古全浊塞音今读清不送气, 它确有与桂南平话属同一方言的可能, 而进一步的认定, 还须看其他方面, 不能单凭这一项就下结论。

2. 关于“浊音标准”

2.1 李小凡(2012) 认为古全浊音今读类型不但能区分平话, 还可以定义所有汉语方言。他说“只需一条浊音标准便足以区分汉语各类方言”。是为“浊音标准论”。李文列表如下:

表 1 中古全浊声母今读类型

方 言 今读类型	吴方言	客赣 方言	平话	官话	粤方言	闽方言	湘方言
浊音	+						舒声多、入声少
清音送气		+		仄声	平声、上声	少数一致例外	入声多
清音不送气			+	平声	去声、入声	多数	舒声少

在分类学上, 单一标准分类的意义有限。用任何单一标准对任何事物都可以划分出若干类别; 这样分类如果是为临时目的当然可以, 但不能保证准确反映划分对象的本质特性。

一个音系内部的分化式音变常有音类条件, 如古全浊声母在粤语广州话中今读塞音分送气或不送气, 以平上、去入为条件, 其中上声专指没变去声者。在这种情况下, 当人们看到两个演变类型相同的方言时, 会直观地觉得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 尤其是谱系上的关系, 是很自然的, 因为音类条件是历史比较研究的第一要素。但如果是无分化条件的演变, 譬如古全浊音清化后塞音全部读送气或是全部读不送气, 那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各占 50% 概率, 如此在不同方言之间偶合、碰巧的可能性就极大。在这个时候, 单一标准就更显局限性。

2.2 说得绝对些, 真正的分类标准应是无例外的特征: 对于特定对象, 对内周遍, 对外排除; 对于所有对象, 则一概囊括, 无所遗漏。但“浊音标准”做不到:

就特定对象而言, 难以周遍和排除。余霭芹(1988) 指出古全浊塞音今读在粤语并非只有广州模式(即表 1 的粤方言模式。参看熊正辉, 1987; 李健, 1996; 侯兴泉, 2006 等)。所以余霭芹说: 古全浊音今读这个“一向认为是划分方言最重要的标准必须加以补充。”陈晖(2008) 归纳古全浊音在湘语中多达 6 种表现, 其中一律读清送气音的方言“放入湘语而不放客赣方言, 更多依据的是古全浊声母以外的其他语言特征”。对此, 陈晖说“我们确实很难用一个标准,

特别是一个绝对排他性的标准,对方言进行自始至终的划分。”在平话,古全浊音不送气确是最常见的,但实际上还存在多种类型,尤其是桂北平话(覃远雄 2007/2012)。

就所有对象而言,表1并未涵括古全浊音今读的全部类型(参看曹志耘主编 2008)。

2.3 “浊音标准论”是利用了根据多项语言特征互相参照而得出的方言划分现有成果,发现古全浊音今读的差异多能与之大致吻合;把少数情况视为例外之后,这一差异与现行方言分区的对应相当整齐,显得直观、简单。再反过来拿它作为标准来分类,会感觉高效实用、易于操作。按一般人的心理,好用的标准似乎就是好的标准。对“浊音标准”的迷思因而形成。

其实,这是为已经划分好的各方言的主体或核心部分找出的最简特征,而非在未完成的的研究中需要做划分方言的工作时,或需要为某方言定归属时,可作决断或释疑的标准。该特征是归纳的结果,而且是为使主体或核心部分形象清晰,把例外或边缘性情况排除之后的结果。在逻辑方法上说,有例外的归纳结果不适用于类推,而依照标准来进行分类正是一种类推。

诚然,归纳是必要的工作,其结果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我们可循此观察和探讨方言之间和方言内部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思考各方言的性质。因此,归纳“最简特征”无可非议,但是一旦把它定为标准,特别是强化为唯一标准,就易引起误会,乃至形成片面的迷思,以为真的靠它就能划分方言及论定方言系属。这很容易导致研究工作中的偏误。

2.4 据陈晖(2008)在湘语古全浊声母独立(如涟源)或清化(如娄底)的方言之间,以及同一方言里古全浊音读法不同的两派(如新化话清化的新派和存浊的老派)之间,可以自如地交流,人们并不觉得互相间语音有什么差异,就是说“土人语感”对古全浊字的不同读法不敏感。可见在这些方言里,古全浊音读法不是重要的语言特征,自难成为划分方言的依据。

侯兴泉(2016a: 316)认为:作为方言分区标准,“辖字多的音节类或音类分合比辖字少的音节类或音类分合重要”。“音节类”(侯兴泉(2016b)称“字音类”)指含有同一音类的音节,“音节类分合”是音位区分在音节层面的表现。换言之,方言区分标准涉及的音位在分辨音节上的作用面应较大,愈大愈有价值。侯兴泉(2016a: 328-329)指出,古全浊塞音在平话和粤语今读的不同基本上没造成音节类混淆。在各声调都分阴阳的方言中,有关音节中声调可作主要区别,声母的送气与否退居次要地位。例如“田”,广州话[t^h]声母,桂南平话[t]声母。在阳平调中,广州话从不出现不送气声母字,桂南平话则从不出现送气声母字,故声母送气与否不会导致音节类混淆;相反,假如只看声母、不管声调,“田”在广州话会混于阴平“天”、在桂南平话会混于阴平“颠”。④

显然,在不同方言里,古全浊音今读造成的音节类分混程度会有差别。多数官话方言阴阳分调只见于平声,其区分音节的覆盖面就较阴阳分调超出平声以外的东南各方言要小,而其古全浊声母今读在音节辨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就相对大;东南各方言则正相反。由此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各大方言区共用的、统一的、都具高效度的划分标准到底是否存在?

2.5 语音史和方言史研究过去侧重语音演变的结果及导致结果的抽象规则,而不太追究

④ 此亦1.3认为外来方言在桂北易受本地方言影响而改变古全浊音读法的原因之一。在一些保存浊声的方言中,古全浊音字带双重特征:浊声母和阳声调。很多场合下,字音区别是落在声调上。汉语史上,声母清浊和声调阴阳这两对特征此消彼长,有如下发展阶段:Ⅰ.清浊为区别特征,阴阳为次要特征;Ⅱ.两者同时为区别特征;Ⅲ.阴阳升格为唯一区别特征,清浊退而为次要特征;Ⅳ.由于浊音已成次要,清化就易于发生,声母清浊最终转化为声调阴阳。存浊的湘语方言有一些处于Ⅱ与Ⅲ之间,或偏于Ⅲ;有的吴语方言亦然。

造成音变的音理。演化语言学认为,要明白演化的音理(朱晓农(2012)的术语是“音法”)才能真正理解音变规则。譬如轻唇化是双唇音变唇齿音,入声韵消变是塞尾弱化,知组合流于照组是龈爆发音塞擦化,等等。可是,全浊音清化是一种什么音理变化?是什么造成清化后塞音读送气或不送气?其中缘由不弄清楚,对其今读类型与方言分化之间关系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表面。向来讨论全浊音清化的文献虽汗牛充栋,而少有能令人理清头绪,这是个重要原因。

高本汉(1915-1926/1994: 168, 254)构拟古汉语全浊音为浊送气,是根据吴语,谓吴语全浊音是浊声带弱浊送气。但赵元任(1928/2011: 61)指出,吴语浊声母其实是不带音(清)声母接带音(浊)气流,即一种气声(朱晓农(2014)称“弛声”)。据考证,汉语古代通语的全浊音原本是气声/弛声;现代官话模式的历史演化过程主要是弛声在低声调变清送气声母,在高声调则变清不送气声母(参看 Zee, 1994; 麦耘, 1998; 朱晓农, 2010b)。这是初步论断,彻底解决还需要语音实验在音理上的进一步支援。实验语音学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最近的例子如曹剑芬 2013),希望还会有更多的成果出现。

就笔者目前听到过一些方言的气声(包括弛声和浊气声即“浊声浊流”),听感上至少有两种:一种没有送气感,或没有明显的送气感,如北部吴语;一种有明显送气感,北部赣语中有浊音的方言有这种类型,南部湘语和四川“老湖广话”也有部分字音如此^⑤。在得到更多语音实验支持之前,本文暂时把有送气感的气声叫“强气声”,无送气感的叫“弱气声”。

笔者假设,在古代,“全浊音”有不同的地域变体,多数方言是气声,有强有弱,辅音或清或浊,不排除常态浊声;弱气声和常态浊声的塞音到后代多变不送气音,强气声多变送气。不同的音值起初只是古代汉语“全浊”这个音位在不同地域的变体,具体音值对一个方言来说固然不是区别性特征,在不同方言之间也不构成音位系统差异。比方说,假定全浊音在北方和江东是弛声,在湖南是浊气声,在岭南、福建是弱气声或常态浊声,在江西和西北一些地方是强气声,但只要“全浊音”是独立的一类,各方言在这个方面就可以看作音位结构一致,没有真正的区别。反之,地域变体相同的方言,也不一定有密切的谱系关系。

由于只是地域变体,在不同方言之间或一个方言内就可以转化,弱气声或变强,强或变弱,或按不同条件(如声调)变化,转化/变化的动力或出于各音系自身的语音演化,或来自方言接触,可以与谱系继承有关,也可以无关。不同的地域变体不一定与当时的方言分界对应,也不一定是后代方言分化的节点。从这个角度看,古全浊音演变是否总是能作为方言分化的重要历史条件,须重新思考。^⑥

3. 从全浊音今读角度论粤语、平话及诸全浊送气方言

3.1 本节准备从古全浊音今读的角度,讨论两个问题:一,粤语与平话的历史关系;二,几个古全浊塞音今读送气的方言(西北部分方言、泰如方言、客赣方言)的历史关系。

^⑤ 崔荣昌、李锡梅(1986)记录“老湖广话”的浊声声母分送气与不送气两套,但似无音位对立。在2008年朱晓农和郭萍的实地录音中,这些声母是弛声(参看朱晓农,2010b)。笔者曾听过其中一些样本,有的带送气感,有的不带送气感。不过若无音位对立,是否有送气感是一种主观感觉,应如何定义,尚需研究。又,宣州吴语的古定母字在气流中带闪音的读法可暂归送气一类。

^⑥ 一个可以今视古的例子:在江苏溧水这个相当小的范围里,古全浊字可以有浊声、强或弱弛声、送气和送气清声等好几种地域变体(石汝杰、顾黔,2006:第十一章)。

下面先讲三个概念,前两个是接触语言学的,后一个是演化语言学的。

1) “推平/覆盖”。强势方言常常能凭借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主要通过制造文读层次压迫白读层次,对弱势方言实行相当彻底的改造,可以造成整类音的替换(参看王洪君 2009/2014; 麦耘 2009)。这不但每见于通语与方言之间,也每见于大方言区的中心方言与其他次方言之间,例如中原汉语(通语的基础方言)与其他官话方言之间,广府话与其他粤语方言之间。

2) “区域聚变”。一些本来不相同的语言共存于一个区域处于稳态发展时,会发生语言特征的扩散,导致该区域中的某些语言特征趋同(参看迪克森,1997/2010)。在这样的区域中,强势的语言会把自己的特征渗透到相对弱势的语言中,在该区域里形成区域性的特征。

3) “平行创新/平行演化”。语言/方言之间的相似不一定与谱系关系有关,也不一定与接触有关;在能确认变异理据时,相似性更可能体现在具有人类语言普适性演化规则背景下,同方向、同类型的演化(参看麦耘 2013、2016)。例如从音理/音法上和感知上说,塞音的强气声容易自然地转化为声母的送气成分,这可以发生在完全没有实体关联的不同方言之中。

3.2 粤语和桂南平话都来自早期岭南汉语,最初主要是秦汉时期岭南土著民族习得汉语的产物。直到唐代,岭南汉语都追随中原汉语发展,是中原汉语在岭南地区的次方言。唐末以后,岭南汉语不再紧跟中原的诸项变迁(如微、日母去鼻音化,塞音韵尾消变,二等喉牙音韵母细化等),便逐步从北方方言中分化出来(李新魁 1983/1993; 麦耘 1997、2009、2010、2011)。^⑦

若要把粤语和平话划分开,确需用古全浊塞音今读为条件。笔者推测,在唐代及以前,全浊音在岭南汉语中主要是弱弛声或常态浊声,其与中原汉语弛声的差异,既非两者分化时出现,亦非分化后才变,而是原本就有,为无区别意义的地域变体;现代桂南平话和勾漏片全浊读不送气清音是继承这种地域变体的结果,是自身演化而成的类型。现代粤语广府片等的平上送气、去入不送气(浊上变去者属去)类型,乃是官话类型的变式,唯浊上保持读上声的部分较多(麦耘 1991),显出比现代官话方言较存古的状态。这当是岭南东部地区大约在宋代受通语影响的结果,应该是先影响粤语的中心广府话,再凭藉广府话在岭南汉语区内的权威地位,辐射式或波浪式地覆盖、推平本区内其他方言,而地处西部、没经受这一覆盖的方言即为桂南平话-勾漏片(麦耘 2010)。^⑧

桂北平话则表现另一种语言接触现象。桂北原属岭南汉语区,历史上陆续有外地方言进入,与岭南汉语共处,在桂北形成一个方言聚变区域。不论外来方言的全浊音原本读什么,来到此地后就受岭南汉语的渗透,成为弱弛声或常态浊声,后来以塞音不送气模式清化。^⑨

一般来说,在语言聚变中,词汇的扩散最为活跃,语法成分其次,语音本是最稳定的。不过,上文已假设古全浊音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读法只是地域变体,所以易于转变。因此,那些外来方言的语音系统中的其他成分至今纷繁多样,而全浊音的读法却被岭南汉语统一了。

3.3 在泰如方言和客赣方言中,古全浊塞音今读送气;西北某些官话/晋语方言的白读层也有此现象。有学者依谱系分析的思路,假设三者之间有源流关系(如鲁国尧 2002)。然而,

^⑦ 官话方言有些后起的创新(如[-m]尾消失、[k]组声母腭化)与官话跟粤语的分化无关(麦耘, 2011)。

^⑧ 此处有条件地参考了刘镇发(2011)的观点。

^⑨ 桂北平话本应与地域相邻的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放在一起讨论(王福堂 2001; 覃远雄 2007/2012)。本文为免枝蔓,暂时撇开后两者。

这些方言音系的其他部分差异甚大。谢留文(1999)认为泰如方言与客赣方言在古全浊音今读这点上,只是类型学上相同。笔者同意谢留文的意见,那的确是类型相同的平行演化。

在宋初或稍前,中原汉语发生了一项创新,全浊音依声调条件分化为强、弱气声两类音位变体,后来分别转变为塞音声母的送气和不送气(参看周祖谟,1942/1966;麦耘,1998)。但西北一些方言没有分化,塞音后来一律变送气。这个层次后来被中原汉语的上述创新所覆盖,只残留下部分白读音。在这一方面,其他一些官话区今天也存在未被完全覆盖的白读层(见钱曾怡主编,2010:22-23)。可见在官话区内,古全浊声母的演化途径原本也是多样化的;今天官话区内部高度一致,是各地官话方言被中原汉语强行覆盖、推平了的结果。

客赣方言在古全浊塞音今读类型方面最接近于内部一致。客赣人群在中古时期从北方迁移到江西之初,他们的方言跟当时的北方方言自是基本相同,是北方方言在南方的一个次方言,如前所假设,其全浊音是气声。后来,以中原汉语为首的北方方言不断发展,例如重韵合流、轻唇化、塞尾弱化乃至消失,等等,客赣方言没跟着走或跟得不紧,遂拉开距离;在全浊塞音方面,客赣方言也抵制了通语的影响,没分化为两类,最终清化后塞音全读送气。

古全浊塞音的读音在西北部分方言受通语影响不彻底,在客赣方言则没受影响,两者的这个相似点,并不表明它们同属于与中原汉语分化后产生的那一支方言,它们只是都保留了原始官话与客赣方言分化之际的一个特征——全浊音是一类。全浊音不分两类是个存古特征;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共同存古”只能证明有关方言属于同一祖语,而不能证明它们属于祖语分化后的同一分支。后来它们的全浊塞音演化路径相同,则是基于相同的普适性理据的平行创新,也不是谱系意义上的共享创新^⑩。在比全浊音读法更重要的方面,如韵母系统方面,客赣方言与西北方言有较大差异:前者保留更多的中古音系的特点,而后者主要是跟着通语一直走了下来,虽亦有不同于通语的独特创新,却与客赣方言无关。

泰如方言一般被划为江淮官话中的一片,但其古全浊塞音今全读送气,从谱系上说无法作为“平送仄不送”的江淮官话的下位方言。它在韵母、声调方面接近吴语而非官话方言;其古全浊音的今读,更好的解释是来自吴语式弛声的强化变体^⑪。如是,则其与西北部分方言白读层及客赣方言的今读相同,互相之间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而是平行的、音理相同的自然演化。笔者推测其全浊音的演变年代较为晚近,划定此方言的历史标准,时代更早、更重要的应在别的方面,譬如韵、调(参看王洪君,2009/2014)。

4. 论统一标准不存在

4.1 直观地看,方言分区重在共时类型的地理分布。然而,学者们都希望从这种划分中大致看到汉语内部的谱系分支。实际上,探讨分区的条件或标准,基本上等于是在寻找现代各方言的共时类型与历史上各方言的不同分化类型之间的契合点(参看朱德熙,1986)。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分区不是目的,而是一个工作手段,主要是大致表现汉语方言谱系树在地理上的分布,加上接触语言学的内容,从中看到汉语方言分化和融合的历史在时间上的线性分布如何

^⑩ 音值上,读浊音是存古,读清音无论送气与否,也无论是否分两类都是创新(不过,从上文2.4可看出,在四声都分阴阳调的方言里,这一创新的意义很有限)。但音类上,吴语、客赣方言、泰如方言和平话在古全浊音不分两类这点上,都是存古(唯客赣和泰如方言把全浊合并到次清、平话合并到全清,这是创新)。

^⑪ 泰如方言的一个主要代表点江苏通州话的古全浊音读法至今仍是吴语式的(汪平,2010)。

转化为现代在空间上的二维分布。对方言的划分以及划分条件,应该有利于对方言分化过程及后来发展历史的理解。

事实上,各家提出的方言分区的条件或标准,也多是从事系分化的角度着眼的。丁邦新(1982/1998)提出的著名的分区原则是“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这种基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决定了提出的分区条件和所分出的方言区,必与方言谱系分支、历史分化有直接的关系。

4.2 对于丁邦新(1982/1998)所提出各项条件,有几个问题还需要思考:

第一,通语历史上古全浊音清化大约在南宋,全浊塞音分两类则大约在北宋初(周祖谟,1942/1966),这并不算太早。

第二,古代音类变化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一般只能以通语为参照,但我们无法断定某一音类在方言中发生音变的年代一定跟该音类在通语中发生音变的年代相同。

第三,即使能确定某个音类的变化在通语和各方言中都发生于同一历史年代,我们也不能断定各大方言就是根据这个音类的演变、在这个年代里一齐分化出来的。

这里先讨论前两个问题,后一个问题留到下文来谈。

关于第一个问题,通语里好些音变,如全浊上声变去声是中唐开始的(王力,1958/1980),非组唇齿化也发生于中唐(潘悟云,1983),[-t -k]尾消变和知组塞擦化都是在北宋(周祖谟,1942/1966)时代都比古全浊音清化要早。逻辑上,只要在这几项中有一项表现存古的方言,如闽语、客赣方言、粤语,其分化年代就可以排在古全浊音清化之前。根据许多证据可以推断,多数大方言在宋代以前就形成了。它们会都以古全浊音的演变为分化条件吗?

第二个问题,同一个古音类的演变在通语中与在方言中,及在不同方言中,完全可能发生于不同年代,有的还可能早于通语。在方言中也确能看到这种情况,如闽语入声白读层读喉塞尾,后来从通语输入的文读是[-p -t -k]尾,显然闽语中入声的口部闭塞消失得比通语早。沈钟伟(2007)把这种现象的性质称为“逆时性”。质言之,凭通语的历史来断定某一音类的演变在方言中出现的年代,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可靠性。

古全浊音在各方言的不同今读类型是何时形成的?通语有历史资料,相对清楚;东部粤语如上所推测;吴、湘语是存古(湘语之一部清化当较晚近)。其他方言尚需再考证。但肯定不能说这些差异跟通语的浊音清化及其中的塞音分送气与否同时形成,更不能说在差异形成的同时造成了方言分化。

4.3 平心而论,像上文2.2那样要求对内周遍、对外排他的绝对标准是不现实的。任何标准都做不到这个要求。上文提到韵母系统的特点更反映方言的亲疏,但是,要从韵母中找出一条或一组能统一用于各方言、周遍而排他的标准,比声母更难。比较之下,也确实是“浊音标准”的适用面最宽,所以李小凡(2012)说“浊音标准是汉语方言整体分类最有效的标准。”“最有效”固然是相对而言,而这里的关键词是“整体分类”,就是在同一个层级上,用统一的标准,把汉语各大方言区一次性地划分开来,如上文表1那样。

前面谈到,方言分区的条件/标准应是共时类型与历史分化类型的契合点。现在的问题是:各个方言的分化类型会集中在一点或某几点上吗?譬如说,会集中在全浊音的分化上吗?换句话说,我们到底是否真的能找到统一的、能同时用于划分各大方言区的“整体分类”标准?

汉语方言的历史是复杂的,每一个方言都有自己的历史。各方言存古程度不同,这已显示它们分化的年代有先后;而导致分化的语言创新内容,每一个方言也都应是独特的,这些创新

点即使有时在不同方言上偶合(如古全浊音今读在客赣方言和泰如方言相同),也不是同一层级上的事,不能用相同的眼光看待。很难说哪个音变在各方言史上都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言,连某一个古音类的变化在各方言历史中是否同步发生,也不易确定。

因此,研究者应当根据各个方言的具体情况,去分别找寻适用于不同方言的分化条件。

4.4 这个问题涉及方言分化是什么模式。看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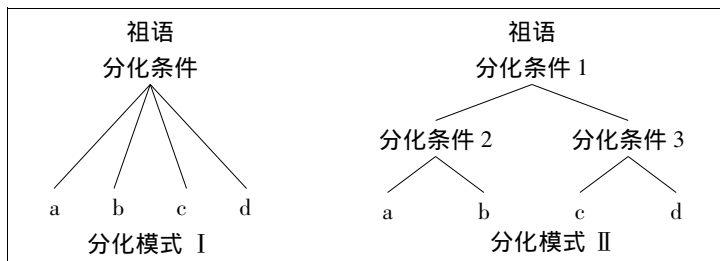


图1 方言分化的不同模式

图1两个模式的区别有二:第一涉及年代节点^⑫,模式I是一次性从祖语分化出各个方言;模式II是分层级的多次分化,各方言分化有各自的年代节点。第二涉及创新节点,模式I的分化条件是各方言统一的一个或一组;模式II在不同层级上有不同的分化条件,而同为第二层级,条件2与条件3也不一定相同,即使落在同一个古音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各自独立的、平行的,互不相干。换言之,在模式II中,各方言分化有各自的创新节点。

用统一的标准划分方言,实际上是把方言的分化视为模式I,而笔者认为汉语方言分化的历史过程更多是遵循模式II。^⑬对汉语各大方言区不应、也不能在同一平面、同一层级上,一刀切地加以分割。简单化地定出一个或一组统一的、固定的、适用面宽的标准,作为对各方言区的划分都具有同样高效度的工具,不啻于说是在同一年代、根据同一条件从汉语“祖语”一下子分化出汉语各大方言来,像模式I那样。据此描述汉语方言的谱系树,以及定义各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难免会扭曲历史,也扭曲现实。即使真能找到这样的“标准”,得到表面看起来整齐划一、干净利索的分区结果,也只会是漂亮的假象,并不反映各方言的本质,不能复原真实的汉语方言分化史和发展史。我们需要的是多层级的、动态的、有历史纵深的、能表现各种复杂的分化条件的分类方法;尽管这种方法会麻烦而低效,却是必需的。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并不存在可用以划分汉语大方言区的统一标准;想用尽量简捷的形式化操作方法来统一为各方言划界,出发点就不妥。直截地说,划分汉语各方言不但不能用“浊音标准”、不但不能用单一标准,而且不能用任何统一的标准。我们只能就具体的方言逐一去探寻其不同于其他方言的年代节点和创新节点(自然还要考虑外部影响和自身演化)。^⑭

徐通锵(2004)和王洪君(2009/2014)在考虑方言分化时都对不同的方言用到不同的分化条件,即不同的创新节点,按不同的历史层级,即不同的年代节点来划分汉语各大方言。具体

⑫ 方言的分化节点包括两方面:分化的年代(“年代节点”)和造成分化的创新内容(“创新节点”)。

⑬ 现行的分区方法在大方言区以下的分片、分小片也是有层级,并使用不同标准的。但大方言区的划分也有层级之分,明确指出这一点的学者不多。

⑭ “奥卡姆剃刀原则”主张研究方法避繁趋简、以简驭繁;但并非一味追求简省,而是说:当简单方法跟复杂方法的效度相同时,繁杂的方法往往会遮蔽真实,而简明的方法则更能让人一下子抓住本质。就本文讨论的内容说,简单的标准和方法能否触及汉语方言史的本质?能否解释各种方言现象?答案是否定的。

的年代、具体的条件以及具体的类聚树状自有可以继续讨论的空间,但他们的工作原则无疑符合历史语言学的原理。本文就是沿着他们的思路,尤其是王洪君(2009/2014)的思路走的。

4.5 下面在麦耘(2011)的基础上加以扩展,画一个暂拟的、简化的汉语方言分化示意图,目的是图解笔者对汉语方言分化条件的大致假设,以说明方言分化之复杂。由于这个假设尚不成熟,所以对各分化节点只从创新角度作尽量简单的说明。因此,画这张图时所参考的前修时贤许多成果,也就没法一一列出(唯有对A节点不能不提及一篇文章),尚祈同仁见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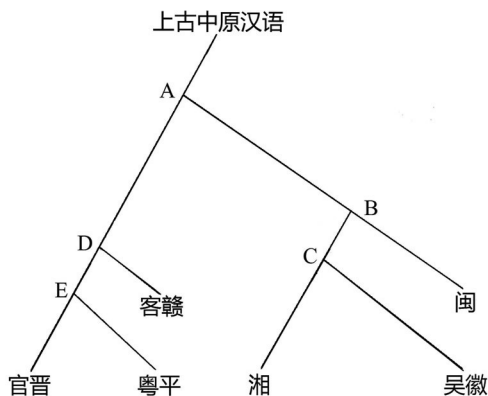


图2 汉语方言分化示意图

说明:

A节点——右支:入声韵和阳声韵韵尾简化,形成上古吴楚方言(参看沈钟伟,2007)。

B节点——左支:音韵系统中古化,例如上古阳铎、耕锡部重组为中古宕、梗摄,之、脂、支部重组为止、蟹摄,等等,形成中古吴楚方言。右支只涉及闽语白读层。全浊塞音的弛声在大部分字中弱化、后代读清不送气音,是闽语的创新。

C节点——左支:音韵系统简化,如重韵

合流、入声韵消亡等,形成湘语。

D节点——左支:在中古前期音系基础上演变,形成中古后期的北方-粤方言。

E节点——左支:音韵系统近代化(其中包括全浊音清化),形成官-晋方言。右支中的“平”主要指桂南平话,也包括部分桂北平话。参看上文3.2。

这个图有两个特点,一是“分化年代分层级”,二是“分化创新各不同”,亦即图1的模式II的特点。对后一点要说明。分化节点的创新是历史上方言分化的条件,不完全是对现代方言划分的标准;这些创新可能在不同方言平行出现,所以并不排他,例如入声韵消亡在湘语和官话中重演。由于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划分标准,确实也无须排他。同时,只要能作出历史的解释,也不要求严格的对内周遍性。尽管本文不同意以古全浊音今读类型为划分方言的统一标准,但并不否定它的重要性,在上述说明中提及了这个因素,如B、E节点,但不在同一层级上。

语言接触的内容在树状图上画不出来。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方言在分化出来之后的历史变迁中受通语/官话的强烈辐射影响乃至覆盖、推平,如B节点的左支实际上就是通语化(与晋室南渡造成的通语覆盖有关),而其知组塞擦化、轻唇化等应是到中古后期才受通语横向影响而发生的。C节点的左支也有关系。至于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融合及少数民族语言在汉语方言中留下底层成分等(参潘悟云,2004、2009;王洪君,2009/2014;麦耘,2009、2011),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参考文献

- 曹剑芬 2013 《“浊音”及其“清化”的语音基础探索》,石锋、彭刚(主编)《大江东去——王士元教授八十岁贺寿文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商务印书馆。
- 陈晖 2006 《湘方言语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陈 晖 2008 《古全浊声母在湘方言中的今读音情况》,《方言》第2期。
- 崔荣昌 李锡梅 1986 《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方言》第3期。
- 迪克森,罗伯特(R. Dixon) 1997/2010 《语言兴衰论》(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丁邦新 1982/1998 《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丁邦新 1996 《书评:中国语言地图集》,《国际中国语言学评论》第1期。
- 高本汉 1915-1926/1994 《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中译缩印本。
- 侯兴泉 2006 《广东封开罗董话的浊内爆音》,《民族语文》第5期。
- 侯兴泉 2016a 《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中西书局。
- 侯兴泉 2016b 《论汉语方言“字音类”的历史比较》,《中国方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
- 李 健 1996 《化州粤语概说》,天津古籍出版社。
- 李连进 2000 《平话音韵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 李新魁 1983/1993 《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新魁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
- 李小凡 2005 《汉语方言分区再认识》,《方言》第4期。
- 李小凡 2012 《平话的归属和汉语方言分类》,《语言科学》总第60期。
- 刘镇发 2011 《现代粤语源于宋末移民说》,单周尧、陆镜光主编《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鲁国尧 2002 《“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上),《中国语文》第6期。
- 麦 耘 1991 《古全浊声母清化规则补议》,《中国语文》第4期。
- 麦 耘 1997 《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音及其历史涵义》,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25, No. 2.
- 麦 耘 1998 《“浊音清化”分化的语音条件试释》,《语言研究》增刊。
- 麦 耘 2009 《从粤语的产生和发展看汉语方言形成的模式》,《方言》第3期。
- 麦 耘 2010 《粤语的形成、发展与粤语和平话的关系》,潘悟云、沈钟伟主编《研究之乐——庆祝王士元先生七十五寿辰学术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 麦 耘 2011 《粤方言的音韵特征——兼谈方言区分的一些问题》,《方言》第4期。
- 麦 耘 2012 《语音体系与国际音标及其对应》,《民族语文》第5期。
- 麦 耘 2013 《软腭辅音与硬腭过渡音的亲合性——一项语音演化研究》,《方言》第3期。
- 麦 耘 2016 《从普适性自然演化的角度观察语言关系和语言变迁》,《中国方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
- 潘悟云 1983 《中古汉语轻唇化年代考》,《温州师院学报》第2期。
- 潘悟云 2004 《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及其类型》,石锋、沈钟伟主编《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 潘悟云 2009 《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方言》第3期。
- 钱曾怡(主编) 2010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齐鲁书社。
- 覃远雄 2000 《桂南平话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覃远雄 2007/2012 《平话和土话》,《方言》第2期《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B1-22说明,商务印书馆。
- 沈钟伟 2007 《语言转换和方言底层》,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石汝杰 顾 黔 2006 《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汪 平 2010 《江苏通州方言音系探讨》,《方言》第3期。
- 王福堂 2001 《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方言》第2期。
- 王洪君 2009/2014 《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方言》第3期《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58/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 韦树关 1999 《桂北平话质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 谢留文 1999 《重读〈临川音系〉》,《方言》第3期。
- 熊正辉 1987 《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第3期。
- 徐通锵 2004 《音变规律和汉语方言的分区》,《南开语言学刊》第4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 余霭芹 1988 《粤语研究》,《语文研究》第2期。
- 赵元任 1928/2011 《现代吴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合编 2015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商务印书馆。
- 周祖谟 1942/1966 《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
- 朱德熙 1986 《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语文》第4期。
- 朱晓农 2010a 《语音学》,商务印书馆。
- 朱晓农 2010b 《全浊弛声论——兼论全浊清化(消弛)低送高不送》,《语言研究》总第80期。
- 朱晓农 2012 《音法演化——发声活动》,商务印书馆。
- 朱晓农 2014 《声调类型学大要——对调型的研究》,《方言》第3期。
- Zee, Eric (徐云扬) 1994 A theory of the bifurcation of the Middle Chinese voiced syllable-initial stops and affricates into aspirates and unaspirates after devoicing. 《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2辑。

麦 耘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maiyun@cass.org.cn

第五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

第五届《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于2017年4月8日至9日在浙江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语文》编辑部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各地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30位专家及青年学者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

论坛开幕式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人文学部主任黄华新教授致欢迎辞,《中国语文》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方梅研究员致开幕辞。

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青年学者报告了近期的研究,主要围绕汉语史研究词汇、语法、音韵、古文字等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针对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理论方法的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特邀专家也和与会青年学者分享了近期的成果和研究心得。与会专家报告有:香港中文大学沈培《从〈老子〉〈论语〉〈礼记〉〈淮南子〉几个跟“遂”相关之词的释读谈汉语史研究中如何利用古文字数据》、浙江大学王云路《谈谈汉语词义研究的古今沟通》、厦门大学李无未《东亚汉语学史:互动、谱系、环流》、浙江大学方一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读北大简〈苍颉篇〉》、浙江大学汪维辉《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语言学对汉语史研究的期待》。

“《中国语文》青年学者沙龙”已经成功举办四届,今年起更名为“《中国语文》青年学者论坛”。本次会议侧重历史语言学领域。今后的会议也将每次侧重一个学科领域。与会学者认为,《中国语文》编辑部每年面向青年学者组织学术论坛,为编者与学者之间、青年学者和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互动平台,为培养学术新人、引导和推动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钟雨)

subjectivisation. The constructions of “V-completive marker” can be ambiguous since the completive markers may develop other functions. The completive markers are situated between lexicon and syntax, the use of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ese is a language which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the semantics of RESULT.

Key Words: completive marker,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lexicalization, aspect

ZHANG Yisheng, On the cliticization of *youjia* (有加)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X-*youjia*”

Youjia (有加, lit. have plus) develops along the cline of “phrase > verb > enclitic”. A tendency is observed concerning the use of the cliticized *youjia*, i.e. the higher degree of transitivity the predicate “X” exhibits, the more likely the clitic is attached. But the tendency is waning with the cliticization becoming more established. The “X-*youjia*” structure acts as a predicate, an adverbial and as a complement. It has undergone the tripartite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 i.e. from cross-IC phrase to GIVE verb, from verbal phrase to postposing complement, and from analogy facilitator to the final construction. Along this chain the cliticization process is becoming full-fledged in term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usage extension, semantic bleaching and phonetic reduction.

Key Words: *youjia* (有加), evolution, enclitic, reinforcement, construction

WAN Quan, Cognitive motivation for genitive to express goal meaning

The main syntactic-semantic property of para-attributive type C(so-called fake nominal modifier) should be generalized as goal-genitive within which N represents the goal, rather than an apparent possessive modifier. There are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motiva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ll of which encounter counter examples. This construction differs from a separable word or a dative construction, because it shares many syntactic-semantic properties of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These two constructions take different conceptualization strategies in ditransitive events for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appeals. The goal in a ditransitive event is profiled against V and O in a goal-genitive construction by attaching *de* (的). Thus, N-O relation turns to be a cognitive referent construction and syntactic possessive structure. Possessives are able to express non-possessive meaning. Cognitively and syntactically, goal-genitive is by no means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possessive. Semantically, there is a class inclusion relation among them. The very function of *de* in goal-genitive makes no difference from that of other *de*-constructions, namely, to enhance the demonstrativeness.

Key Words: genitive, para-attributive, *de* (的), ditransitive, class inclusion, 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

MAI Yun, Revisiting the criteria for Chinese dialectal region demarcation: A case of the “Zhuoyin criteria”

The article argues against the so-called unified criteria for Chinese dialectal region demarcation through the exemplification of the present pronunciation typology of the ancient *Quanzhuo* initials, which has hitherto been regarded the most effective criteria. The nodes of the historical divisions vary among dialects in both time and mode of innovation, so do the conditions for demarcating them, in order to approximate to the historical reality regarding dialectal division. No single or unitary criteria can possibly be expected to divide the Chinese dialects once and for all.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tentatively proposes a schema on Chinese dialectal division with one of the aims being to merely demon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conditions for dialectal division.

Key Words: Criteria for dialectal demarcation, present pronunciation of the ancient *Quanzhuo* initials, nodes of division, historical reality

ZHUANG Chushe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motivation for labialization of the *Xiao*-group characters with closing medial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In many southeastern dialects except Min, it has been extensively reported that the initials of the *Xiao*-group characters with closing medial are pronounced as labial fricatives nowadays, referred to as labialization in this study. This phenomenon has also been observed in dialects of Southern Mandarin Chinese, including Southwestern Mandarin and Jianghuai Mandarin. In previous literature it wa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rounded vowel effects of [u] vowel or [u] medial trigger the sound change: the fricatives of velar [x] or glottal [h]